

從巫到醫

文/林富士

瘟疫所侵襲的對象，通常不分男女老幼，不管貧富貴賤，也不論高矮胖瘦、東西南北，更不計美醜善惡，一律「平等」對待。這種特性對於宗教所造成的衝擊格外劇烈。本文以中國史上大規模瘟疫與道教興起為例，一窺宗教對於瘟疫的解釋與對應之道……

道教在疫場中崛起

多數宗教都將疾病歸因於人觸犯鬼神禁忌或宗教戒律所引發的「懲罰」，而在瘟疫流行之時，善人與惡人同遭荼毒的情形屢見不鮮，「好人不長命」、「壞人得善終」的例子也不少見，也因此，在瘟疫橫行之際，「報應」觀總免不了會受到質疑，而宗教人士也必須有妥適的回應，否則便不易說服信眾。

以中國的情形來說，在東漢王朝最後的一百年之間（西元一一九至二二〇〇年），至少十一次的「大疫」流行。而且，瘟疫並未隨著漢帝國的崩解而結束，相反的，從西元三世紀起一直到六世紀，將近四百年的時間裡，至少有二十七次「大疫」流行見於「正史」的記載，平均一、二十年便爆發一次，當時人的平均壽命即使只有三十歲，終其一生，大致都會遭逢或聽聞一次瘟疫的侵害。

活在這樣的歷史情境之中，面對無常的生命，酷毒的瘟疫，人總不免會有所不安、惶惑、和恐慌，一些維繫社會秩序的法律規範、人生價值、道德標準、宗教信仰也會遭受挑戰。例如，從西元二世紀起，便不斷有人質疑「仁者壽」（好人長命）這個舊有的信條。有人甚至完全放棄被儒家視為「天經地義」的「三綱五常」。也因此，在漢代「獨尊」的儒家思想，到了魏晉南北朝時期，便不再能獨自主導中國社會的道德、倫理世界，道教與佛教也趁機擴展其勢力，形成三足鼎立的態勢。

其中，道教幾乎可以說是因應當時的瘟疫而生的一個新宗教。較早的兩個道教團體，太平道和五斗米道（又叫天師道），在東漢末年出現時，都是以「醫療」做為吸引信徒的主要手段。到了魏晉南北朝時期（西元三至六世紀），道教內部雖然門派林立，但仍多以「醫療」做為傳教的主要手段，或是鼓勵修道之士要修習醫術以自救救人。同時他們也針對疾病與瘟疫的現象提出了看法。

道教的瘟疫觀

道教對於人生病的原因，大致採取醫家的解釋，認為衰老、情緒、生活起

居（食衣住行、性愛等）、氣候變化、毒蛇猛獸等，都是致病之因。但是，除此之外，道教堅信人在道德方面的缺失和惡行所引發的鬼神責罰，才是最難救治的疾病根源。

道教宣稱，人的壽夭都有定數，但是，善惡將會影響一個人能不能終其「天年」或是延年益壽。他們認為，在天上司命神，在家中有灶神，在人體內有「尸蟲」，這些鬼神隨時隨地都在監察、記錄人的善行及惡行，上天則會根據人的善惡記錄，增加或減少其壽命，而生病便是為惡行的後果之一。

這種素樸善惡報應觀念，在瘟疫流行的時代，自然容易被人質疑，而道教也提出了一些補充說明。其中，最有名的就是所謂的「承負」。「承負」簡單說，就是繼承負債或承受負欠。善人之所以會在瘟疫來襲之時無法倖免，主要是被「他人」的惡行所波及。「他人」包括自己已過世的歷代祖先，和同時代的鄰里鄉黨，而更重要的是歷代和當代的君王。

「他人」行惡，雖然本身會遭受上天懲罰，但若罪惡深重，所罰不足以償其所罪，便會像負欠債務一樣，遺留下來，由其後人或同時之人負債償還。換句話說，道教將所有人類（包括過去、現在與未來）視為一個「生命共同體」，必須共同承受任何一個人的禍福。因此，即使一個行為非常端正，道德良善的人，可能會受他人連累而受到不好的「報應」，因而在瘟疫來時死於非死。

另外，道教還提出和「承負」說息息相關的「末世」理論。他們認為，當人類所犯的罪行愈多，懲罰所下的「餘殃」也就會愈積愈多，終至促使「末世」到來。而在「末世」之時，由於世人作惡多端，便會導致「陰陽不調，水旱不適，災變屢見」，寇賊充斥，萬民流散，死者過半，十有九傷。一時之間，水、旱、刀兵和瘟疫之災接連不斷。

其中，瘟疫主要就是由上天（或太上道君）派遣五方「鬼主」（瘟神）率領眾多的「疫鬼」到處施放疫氣所造成的。其主要目的是要「誅除凶惡」，留下「善種人」（又叫「種民」）。

不過，「末世」之時，也會有一些由「敗軍死將」或「橫死」之人所化的「厲鬼」、「疫鬼」，他們往往會乘機作怪，亂放「疫氣」殺人，善惡不分。因此，末世的瘟疫來襲之時，善人有時候也會被枉殺。

解救之道

因此，在瘟疫橫行的年代，道教所提出的醫療方法，除了傳統的醫術（針灸、藥物）、巫術（禁咒、符水）、養生術（導引、按摩、存思、房中等）之外，特別強調「首過」（懺悔）以及積累「功德」（包括誦經、齋醮、施捨、善行等）。同時，他們也不反對以「革命」的手段終結「惡政」，建立新的、善的政權，以「解除」人民所「承負」的「惡政」之苦。

瘟疫所帶來的衝擊是全面性的，宗教也不能豁免。但從中國早期道教的例子

來看，若能適切回應，瘟疫是宗教得以蓬勃發展的契機。因為，宗教是人類面對瘟疫，尋求身心安頓時的一個主要歸宿。即以近、現代的台灣社會來看，由於瘟疫不斷，具有「瘟神」性格的「王爺」也就成為民眾膜拜的主要對象，而道教的「和瘟」儀式依舊是用以防瘟逐疫的大典，東港東隆宮每三年舉行一次「王醮」（「瘟醮」）便是最有名的例子。

（本文作者為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）

建安文學之殤

東漢獻帝建安二十二年（西元二一七年），一場瘟疫橫掃中國，奪走不少人命，當時文壇最閃亮的幾顆明星幾乎全部殞落。例如「建安七子」中的徐幹、陳琳、應瑒、劉楨、王粲都在同一年死於瘟疫。不過，建安時期（西元一九六～二二〇年）所樹立的文學典範卻不曾從中國文學史上消逝。

當時文壇流行的創作母題主要有兩個。第一個是「神仙」，例如，曹氏父子（曹操、曹丕、曹植）及王粲都曾歌詠過神仙世界或質疑神仙不死的可能。

另一個則是「死亡」，當時有不少專為傷弔某人死亡而撰的「誄」、「哀辭」、「悼亡」、「傷夭」這一類的文體和作品。另外，建安文人也喜歡用基調哀傷的「短歌」、「挽歌」（又叫「薤露」、「蒿里」）闡述生命倏忽即逝的本質及死亡景像的悲慘。同時，孤兒、寡婦的愁苦和憂思也成為書寫的主題，有一些「寡婦賦」還留傳至今。這些題材並非無病呻吟下的產物，而是在瘟疫與戰爭接續不斷的衝擊之下，歷經亂離、喪亡之後的一種反思、憧憬、恐懼、茫然和抒情。

而對於建安諸子而言，文學創作似乎也是療傷止痛的良方，例如，曹丕在「疫癘數起，士人凋落」之後，曾寫信給友人說：「生有七尺之形，死唯一棺之土，唯立德揚名，可以不朽，其次莫如著篇籍。」我想建安文壇的一些「不朽」之作，應該也是在這種心情之下完成的。（文/ 林富士）

不絕於史的瘟疫

史書上對於瘟疫的記載繁多，《明史》、《清史》甚至另闢〈疫疾〉篇章。但古代的「疫」不單單是傳染病而已，晉安帝義熙元年的瘟疫：「十月，大疫，至發赤斑乃愈。」就曾引起學者諸多討論，有些學者猜測可能是由寄生蟲引發的疾病。而瘟疫的發生常是對為政者的重大考驗，如范曄在《後漢書》中，對順帝永建元年的疫情亡批判：「姦慝緣間，人庶怨讟，上干和氣，疫疫為災。」史書上的瘟疫記載死傷人數，有慘烈如《晉書》的〈武帝紀〉所記：「十一月，大疫，京都死者十萬人」；十二月「大疫，洛陽死者太平」。或《宋史》：「紹興元年六月，浙西大疫，平江府以北，流屍無算。」而不只是人會染疫，牲畜亦有疫情書於史者，如《魏書》〈太祖紀〉：「八月帝自魯口進軍常山之九門。時大疫，人馬牛多

死。帝問疫於諸將，對曰：『在者纔十四五』」。 (整理/編輯室，資料來源/《疾病總結者》)